

拯救主体应对社会危机

——评阿兰·图海纳《我们能否共同生存?》

沈洪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

处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,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网络制造了同一面目的世界,文化多样性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与此同时,不同形式的社群主义、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纷纷亮相。我们的出路在哪里?20 世纪后半期,很多理论家开始回应这一问题。阿兰·图海纳,法国著名社会学家,就是其中之一。在《我们能否共同生存?》这本书中,他从主体的角度批判古典社会学,反思现代性的缺陷,将社会运动置于社会分析的核心,他认为应对社会危机要建立在主体拯救的基础上。

经济与文化分离是我们时代的危机

二战以后,帕森斯浸透着进化论思维的功能主义方案如日中天,成为社会学的典范。但是,图海纳对他的理论非常排斥。首先,无论是马克思那样的批判理论家,还是具有保守色彩的帕森斯,他们总是识别出传统向现代、落后向文明、特殊向普遍的演化。的确,我们的社会确实在进化,但关键是谁在进化?非西方、无产者、边缘的文化被排除在进化序列之外。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群岛之后,进步也接近于野蛮。图海纳说,“我们再也不相信进步,再也不相信更大的繁荣会导致民主化和幸福了。”其次,在进化思维的支配下,行动者要么推动进步,要么就是进步的障碍,从而完全处于被动或从属的地位。图海纳说,我们应该避免两种幻觉:一是将社会行动从社会系统中抽离出来进行分析;二是去描述一个缺乏任何行动者的系统。

图海纳将我们时代的危机概括为经济与文化的分离:一方面是从现代社会及其制度的废墟中涌现出生产、消费和通讯的全球化网络,另一方面是价值、文化以及纪念场域构成的集合体。19 世纪中期,马克思说,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、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。不出马克思所料,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横扫世界,扩展至全球,创造了一个地球村;但出乎马克思预料的是,那些地方性的文化和宗教正在复活,建立抵抗的战壕,声张自己的声音。于是,图海纳满怀忧虑地指出,一个是由社群组成的大陆,它坚决抵制来自外部的个人、思想、风俗的进入;另一个是全球化的大陆,它对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只施加少许的控制。我们和他们,中心和边缘,圈内和圈外,还能共同生存吗?

“脸谱”不再被抹去

为应对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危机,图海纳将社会分析牢牢建立在主体的基础上,与罗尔斯的“政治人”和哈贝马斯的“沟通人”有很大不同,图海纳的主体观点更为现实和具体。

首先,主体不是角色、权利和义务,而是在为将自身建构为行动者的努力和斗争。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,就是国家为个体安排一个位置,并赋予相应的责任伦理和社会价值,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这两条路径,个体被吸纳到制度设置中。换句话说,只有成为合格的公民,才能成为“社会人”。这种社会理想背后的假设是,只有国家才能协调自私自利的个人之间的冲突,促进利益的最大化,并且在将地方文化吸纳进国家空间的过程中,保存和延续文化的意义和功能。如今,市场的扩张超越了国家的限制,在全球范围内展开,而每一种社群都力图建立抵抗的堡垒,将自己封闭起来。在这种环境下,我们如何界定个体呢?图海纳从现实生活的斗争中来界定主体。图海纳说,主体就是自由、解放和拒绝,就是对幸福的追求。

其次,主体是连接工具性行动与文化认同的桥梁。韦伯对现代性及其危机的分析深深影响了

图海纳，他不断强调，我们的生活深受行为与意义、经济与文化分裂的痛苦。但是，与韦伯满含忧郁色彩的“牢笼”比喻不同，图海纳亲身参与社会运动，在悲观的时代充满了乐观。他认为，主体在斗争的道路上，既摆脱了市场的控制，又打破了社群的禁锢。这种对主体的追求，用吉登斯的话说，就是看个人是否有能力把一个特别的故事继续讲下去，以便在自己经验的延续中设想自己的一生。我们要在对分裂之苦的抗争中寻求经验和生活的意义。

最后，主体打破了行动与系统分裂的局面。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强调自我的重要性，也将行动纳入到他们的分析框架中，但是，他们始终强调社会秩序的优先性，而社会的制度、观念和价值观只有转化为自我的内在信仰，制度与个人之间才能耦合起来。图海纳批判到，内化自我的统一性，仅仅是社会制度和君王的统一性投射到个人身上的影子，因而，在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那里，自我仅是傀儡性的概念。对主体的强调，就是要根绝这种分离的局面，从全新的角度界定社会生活。

在后现代主义横行、权力观念肆虐的背景下，到处都充斥着主体消亡、文化危机的论调。在《词与物》中，福柯讲述了一个寓言，“人就像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谱，海水袭来时，这张脸谱将被抹去。”我们很容易受到福柯主义的诱拐，但是，当人的存在都成为问题后，行动和生产社会的勇气也就消失殆尽了。如果想要唤起斗争的勇气，重建社会，最好还是跟随图海纳的信条，“主体想成为一条不受河岸限制的江河，流遍整个三角洲”。